

在浙之滨

王元骧教授七十寿庆
暨浙江大学文艺学研究所成立五周年纪念文集

◎徐岱 主编

文艺学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浙之滨

王元骧教授七十寿庆
暨浙江大学文艺学研究所成立五周年纪念文集

◎徐岱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浙之滨:王元骧教授七十寿庆暨浙江大学文艺学研究所成立五周年纪念文集/徐岱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1

ISBN 7-5633-5019-5

I. 在… II. 徐… III. ①王元骧—学术思想—研究
②文艺学—文集 IV.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636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0.125 字数:216 千字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如果发现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王元骧先生的文艺学道路

- 3 七十感怀
——兼谈我的学术生涯
/王元骧
- 30 关于艺术形而上学性的思考
/王元骧
- 50 艺术的实践本性与文艺学的方法论变革
——为王元骧先生的文艺学观点一辩
/苏宏斌
- 66 现实与可能之间
——谈王元骧先生对浪漫主义理论价值的重新评估
/邹广胜
- 84 人学本体与理性思辨
——王元骧先生文艺理论思想研究
/朱首献
- 96 从审美认知到实践反思
——评王元骧先生的审美反映论与艺术实践论
/李咏吟

第二辑 文艺学思想的自由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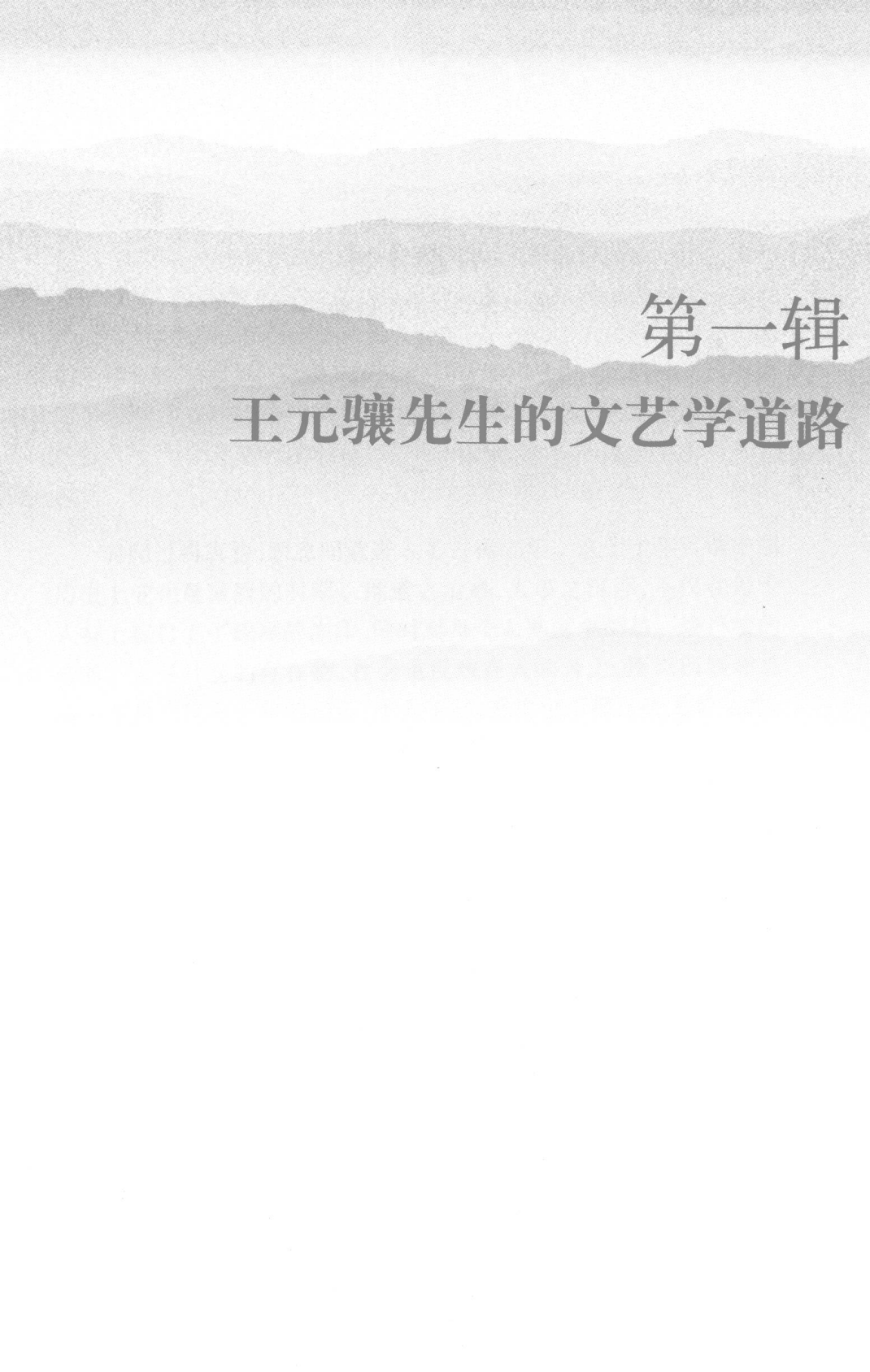
- 115 文学批评的范式
——重新审视别林斯基论普希金
/徐 岱
- 129 当代文艺学中“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讨论及概念清理
/徐 亮

- 148 语言与艺术
/金健人
- 169 文艺目的论的双重视界及其价值归依
/李咏吟
- 186 本体论的变革与现代美学的出路
/苏宏斌
- 197 20 世纪 60 年代文科教材的编撰与文艺学范式的转化
/王建刚
- 210 论当代小说的叙述反讽
/黄 擎
- 220 美好生活的道路何在？
——施特劳斯关于“耶路撒冷和雅典”之命题的思考
/梁 慧

第三辑 文艺学思想的现代性解释

- 239 波德莱尔与审美现代性问题
/沈语冰
- 253 想像的真理
——论想像与真理的关系
/徐法超
- 263 真理与艺术关系的批判性考察
/莫运平
- 276 尼采的真理观与艺术观
/李 骏
- 289 审美泛化与快感转向刍议
/傅守祥
- 303 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述评
/段吉方

316 编后记



第一辑

王元骧先生的文艺学道路

七十感怀

——兼谈我的学术生涯

王元骧

—

时间过得真快,瞬息间就进入了古稀之年。这七十年可谓中国历史上变化最激烈的时期。世道之沧桑,人事之沉浮,不仅在每个人身上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同时对每个人来说也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社会也反映在人的身上,所以回顾和总结一下自己这七十年的经历,于人于己,或许也不都是毫无意义的。

我于1934年10月出生于浙江东海之滨的一个小镇——玉环县楚门镇。父亲王慎安是浙江永康人,在楚门复利盐厂任内账。因为母亲是玉环人,所以就在玉环定居了。抗战时期交通阻隔,自我出生以来,父亲从没有带我回过永康,我对永康一无印象,所以我也就一直视自己是玉环人。后来复利盐厂倒闭了,连房屋也毁于日寇的炸弹之下,父亲又经朋友介绍到黄岩路桥和临海久如油行继续任内账工作,一直到他退休。父亲到黄岩、临海工作之后,一年难得回家一次,因而我就在母亲身边长大。我小时虽不算顽劣,但由于母亲对我娇宠有加,所以比较任性。不过母亲对我还是管得很牢,加上当时周围邻居的孩子也不多,这样就渐渐养成我喜欢一个人在家里自由自在地画画和无师自通地做一些小玩意儿的习惯。以致我六岁(虚岁)上学(东方小学)后由于不习惯学校的生活而常常逃学。当时楚门庙宇很多,常年都有戏班子在庙内演出。我常常背着

书包出去,然后把书包往墙洞里一塞,就跑到庙里去看戏。无钱买票就在门口等着,碰到认识的大人就请他带我进去或一直等到演出临近结束“放山门”时去看个尾巴。不仅白天看,有时晚上也看,记得有一回“三官堂”上演连台戏《孟丽君》,演了12晚我就去看了12晚。到了最后一晚,由于过于疲劳就趴在椅子上睡着了,直到戏散清场时一位老爷爷把我叫醒,我才睡眼惺忪地回家睡觉。母亲根本管不住我,所以我的学习成绩很差,还常常留级。

大概在1942年秋天,日寇入侵楚门,母亲带我和妹妹到芳杜乡柏台村外婆家去避难,一住就近两年,在那我过着很像鲁迅在《社戏》中描写的小时在外婆家过的生活。当时柏台村没有小学,父亲看我这样下去学业全荒废了,就于1945年秋天带我到他工作的所在地临海的赤城镇中心国民小学去读书。1948年夏小学毕业,鉴于我从小喜欢做一些小玩意儿而不爱读书,父亲就准备送我到林海一家银楼去当学徒。母亲来信说两年多没有见面了,希望父亲暑假带我回一趟楚门。回到楚门,正值刚建立不久的楚门玉环县立初级中学在招生,由于邻居的劝说,我在一无准备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前去应试,结果以倒数第二的成绩被玉环县立初级中学录取了。

在玉环县立初级中学学习的三年可以说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时期。这三年不仅培养了我对文学的浓厚的兴趣,而且通过语文教学和课外阅读,也使我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当时教我们语文课的先后有戴汉节、赵灵筠、赵铁铮、庄钟庆等老师,而其中戴汉节、庄钟庆老师的课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十年前我为《玉环文史资料》写的一篇《家乡生活琐记》中曾这样记叙过戴老师为我们上第一堂语文课时的情形,我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转引在这里:“那时新生入学没有什么始业教育课,我进入初中读书第一天的第一堂课就是语文课。由于一下子跨越到一个新的学习阶段,而且又是第一堂课,所以颇有些兴奋和激动。我们静静地坐在课堂里,新奇而又热切地等待着老师的到来。一阵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30岁左右,穿着一身白色衣服,面孔黝黑,目光深沉,额头飘着一缕微曲的头发的

老师走上讲台,情态优雅而又安详,这就是戴老师。我已记不起他是怎么开讲的,总之他没有按照课文的次序来教,而是叫我们翻到许地山的《落花生》,接着他就从容不迫、娓娓动人地讲授起来。他的声音也很优雅而安详,就像一股山涧中的清泉,幽幽地流淌出来,滋润着我们的心田,使我们像沐浴在春风之中,感受到一种生命复苏的喜悦。我感到自己好像是一棵吸足了甘泉和阳光的小草,似乎一下子长高了不少。这不仅是一堂语文课,而且还可以充当一堂始业教育课,不仅是我进入初中,而且也是深入人生、进入社会的一堂始业教育课!课文中爹爹教育孩子说的一段话:‘花生底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经由戴老师的讲解,就感到特别深情感人,迄今回想起来仿佛还在耳边!课文中点题的话:‘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也就有意无意地成了我的座右铭。直到今日,我还是喜欢默默地干而不习惯于抛头露面。”除了课堂教学之外,在老师的倡导下,学校里还成立了很多社团,我参加了文学和美术类的社团。文学方面的书学校图书馆里不多,楚门也没有书店,我就写信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骆驼书店、作家书屋、万叶书店……要来各种图书目录,选择所喜爱的书,写信要求父亲在临海买或自己节衣缩食省下钱来托到温州办事的人带。如果临海、温州都没有,就汇钱到上海邮购。由于这些书都来之不易,我就加倍爱惜,以致养成爱书的癖好。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大情愿把书借给别人而宁可送给别人。像鲁迅、屠格涅夫、巴金、斯托姆、普希金、叶圣陶、朱自清、冰心、高尔基、沈从文、王鲁彦、夏衍的一些作品,就是在那时读的。在阅读的同时,我还喜欢写作,作文也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以致有些同学叫我

“小鲁迅”，自己也很希望长大后当个作家。当时虽然有些偏科，但却学得相当主动而又灵活，从而使我一生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初中的三年很快就过去了。1951年夏天我初中毕业时，玉环县立初级中学还没有高中部，少数家境比较富裕的同学就到温州去继续读高中或工业学校，这对大部分同学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家正在犹豫彷徨之际，不知是哪位老师还是同学倡议：读师范去。因为师范生当时是国家包下来的，不要家里多少资助。这样，余下的十几个同学就结伴同行去瑞安郑楼，成了浙江省立温州师范学校的第一批玉环学生。

由于我从小不爱运动，到了十六七岁时仍长得非常消瘦，别人和自己都怀疑是有肺病，因而在温州师范学习的头两年变得比较消沉，也没有初中阶段那种美好的梦想推动自己去学习了。加上由于初中阶段偏科比较厉害，数理化的基础没有打好，所以要花很多力气去进行补习，在语文学习方面似乎没有什么长进，倒是意外地培养了我对音乐的浓厚兴趣。

师范毕业应该是由国家分配到小学教书的，但当时正是我国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期，高中毕业生的人数已经不能满足高等学校招生的需求。所以到了1954年夏天，正当我们师范毕业的前夕，省教育厅下了文件，说要推荐一批普师毕业生去考大学，但必须专业对口，即必须报考师范院校。我也是被推荐报考的对象之一，这样1954年8月我就被当时浙江唯一的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即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和理学院的一部分，之江大学和杭州俄语专科学校合并组建的新成立不久的浙江师范学院录取，成了浙师中文系的一名学生，这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事。

我知道若是在解放以前，像我们这样家境的孩子是读不起大学的。所以，到了浙江师院之后就暗中发奋努力，以求将来好好地报效祖国。但是在浙江师院四年，我们实际上只学了两年，因为1955年春夏之交就开始“反胡风”，接着是“肃反”，1957年春夏之交又开展“反右”，以后又是“大跃进”以及“教改”等运动，这些运动都是停

课进行的。而在这两年中,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1956年。当时党中央宣布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根据毛主席的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出现文化建设高潮的思想,在这一年的春天,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学校也闻风而动,召开了“向科学进军大会”,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成果展览会,并邀请了许多著名学者来浙师讲学,属于中文专业的在我印象中有冯雪峰、巴人同志和刘大杰先生等。同时,中文系在我们年级还尝试推广学年论文,这更是把我们学习的积极性推到了最高点。在中文系当时所学的课程中,我最喜欢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所以我所选的学年论文的题目是《屈原的〈九章〉》。但在写作过程中,我感到自己的分析总是深入不下去,这就使我回过头来去找一些文学理论的书来看,从而对文学理论的兴趣开始与日俱增。

1958年夏天从浙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刚成立的杭州大学。当时杭大中文系教职工只有六人,一位系主任,一位总支书记,两位讲师和两位助教,我就成了两位助教的其中之一。中文系一年级的主干课是“文学概论”(当时叫“毛泽东文艺思想”)和“现代汉语”。“毛泽东文艺思想”由从中央下放到浙江的原《人民日报》副刊主编,左联时期的老作家、老翻译家,当时杭大副校长林淡秋同志主讲,我做他的助教。从此,文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也就成了我终生从事的工作。

二

不到半年,省委决定将浙师并入杭大,林淡秋副校长就不再担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讲了。浙师的家底虽然以老浙大等历史悠久的学校和院系为基础,但以往浙大等校的中文系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像“文学概论”等理论课都是解放以后学习前苏联而新设的,所以浙师当时主要从事“毛泽东文艺思想”

教学的是一位由古代文学转行过来的老讲师；原先还有两位从北师大等校进修回来的年轻教师，“反右”以后也不知什么原因被调走了。虽然浙师当年也留了两位与我同届的同学充实文学理论教学队伍，但自从两校合并之后，其中一位就完全转到系总支去工作了，她只是在总支工作之余承担三个班的辅导任务；另一位是浙江省的短跑健将，是浙江省 100 米短跑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平时在外地集训的任务非常繁重，自然没有时间再去从事经常的教学工作。所以，实际从事“毛泽东文艺思想”教学的主要是那位老讲师和我（原本规定助教三年后才能上讲堂的，但那正是一个“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大跃进”时代，所有框框都被打破了）。那位老讲师身体不好，患有较严重的肺气肿。一旦他病倒不能上课，不仅中文系一年级 360 多位学生的课（分两个大班上），还有新闻系的课、中文系全省（还有一些邻近省份，如江西、福建）1000 多个函授生的答疑工作，就全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再加上浙江师院并入杭大后，由于浙江没有高等师范院校，就由原先杭州师范学校“戴帽子”成立了一所杭州师范专科学校（即现在浙江师大的前身），他们没有文学理论教师，于是也要由杭大教师去兼任（因为那时是一个“共产主义风格”大发扬的时代，我去兼课不仅没有拿过他们一分钱的报酬，而且还自费坐车前去。但我依然觉得非常光荣，非常骄傲。这也培养了我以奉献为荣的思想，直到今天，我还不习惯那种什么都可以以金钱来交换的做法）。承担这么多的教学任务，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助教来说，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就这样勤勤恳恳全力以赴地工作了一年多，我却被总支书记叫去挨了一顿迄今都使我茫然的严厉的批评。这位书记是从外交部下放到浙江的一位女同志，她姓蒲单名光。她见到我时第一句话就是：“王林祥（我在学校里所用的名字），你说，你留在杭大这一年多走着什么样的路？！”我一时茫然，什么都说不出来。她接着就自问自答：“你走的是一条白专的路！你跟着×××（即那位由古代文

学改教文学概论的老讲师)跑。……听说你对教改也很有抵触情绪,说:‘什么叫革命?’是不是?!”我这才恍然大悟她对我这样不满和叫我去谈话的原因了。因为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我国掀起了一场批判前苏联“修正主义”的高潮,文学理论领域被看作是前苏联“修正主义”的重灾区,所以有些领导提出文学理论教学内容必须“彻底革命”,这位书记在会上也曾多次强调这一点。大概在1960年春夏之交时,我们收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编写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教学大纲》,我看了后问教学小组(当时我们还没有文艺理论教研室,只是现代文学教研室下的一个“教学小组”)的一位同志:“你看这个大纲是不是彻底革命的?”他没有听清我的话,也许误解了我的意思,并按他的理解向总支书记作了汇报,以致她这么恼怒。我立即向这位书记作了解释,她说:“呵!他可能听错了。”但接着又换了话题,说:“你打过入党报告,我们一直在考察你,想发展你,但是你好像没有这个要求,一年多来你没有向我们汇报过一次思想,我们是不做拉夫的……”这话我有些不能理解:我觉得这一年多来在教学上我是尽心尽责的,这难道不是在为党和国家工作?难道不是在向党组织汇报?何况,我当时思想非常单纯,几乎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对领导的话也从未有过丝毫异议,确实也没有什么可以汇报的。不过,我觉得她是一位心直口快、对我坦诚相待的人,她批评我是因为恨铁不成钢,而她并没有把我当作“外人”看待,我内心还是非常感激她的,所以这件事在当时似乎也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思想压力。但是尽管她没有把我当作外人,而我自己却很不争气,因为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是那种绕着领导转的人。据说当时中文系教师和学生中有的入党积极分子一个星期找组织汇报一次思想,一次书面思想汇报竟写了70多页,这更是我一辈子都学不会的,何况还有许多工作等待我去做。当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阶级斗争为纲”,党的中心工作就是抓“阶级斗争”,运动不断。不久又来了什么“反右倾”运动,原来在浙师深受师生尊敬和爱戴的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焦梦晓同志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接受批判,有些

批判大会和小组会议也邀我参加,但由于我不会唱高调,不会不负责任地讲一些违心的话,因而时时觉得自己跟不上形势,难以适应这样的环境。再加上当时中文系每年都有一些青年教师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调到中学里去,所以我常常依稀觉得这也必将是某一天我要走的路,内心是相当焦虑不安的。

虽然我最终没有被调出杭大,但逆浪却一个接一个地向我扑来。“毛泽东文艺思想”课到1961年又被改为“文学概论”课,根据从事“文学概论”数年的教学实践经验,我逐步认识到若是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不搞科研是难以提高教学质量的。所以我想把教学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加以清理、排队,一个一个地去进行研究。当时学校里分管中文系的是林淡秋副校长,他平易近人,经常深入课堂听课或到办公室里同我们个别聊天。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向他说了,颇能得到他的赞同和支持。由于那时是讲阶级斗争的时代,学界也流传这样一种理论:典型性就是阶级性。但上课之后学生总是要问:阿Q是什么典型?贾宝玉是什么典型?奥勃洛摩夫是什么典型?福玛·高尔杰耶夫是什么典型?他们难道可以作为他们所属阶级的代表吗?他们的性格难道是他们所属阶级的阶级性吗?为了辅导时能回答学生的这些疑问,我就把艺术典型问题作为我研究的首选题目。我是不赞同典型性就是阶级性的,但也反对把典型形象加以肢解,抽取出其中某些性格特征作孤立的分析,我觉得这是由一种简单化走向另一种简单化。所以当1963年初我在《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上读到蔡仪的《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一文时,对其中所谈到的人物的典型性可以不从整个人物性格,而可以从其中某些性格突出的点,即所谓“性格核心”来做定性的观点,我认为是一种排除社会历史内容的抽象的机械的分析方法,同样是不足以真正解释典型人物的典型性的,因而就写了一篇文章寄到《文学评论》与他商讨。过了三个月,我收到《文学评论》的退稿,并附有编辑部给我的长达十页的信,说考虑到这篇文章“对于典型问题讨论有所帮助,曾考虑发表,因此在原稿上作了些删节,并用红笔批了版

式”，“后来由领导作最后决定时，认为您的文章对蔡仪同志的批评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因而决定不发了。但我们还是把您的文章转给蔡仪同志看了，并嘱有什么意见可以与您直接通信讨论”。我看了这封信后首先是惊喜，因为写这篇文章我并没有费多少力气，邮寄时也并没有寄希望于作为论文发表，认为至多也只不过当作读者来信摘录部分作为刊物的补白而已，想不到竟差一点在《文学评论》上作为论文刊出。这使我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水平似乎也还可以。其次是感动，当时还没有复印的条件，随信之后这位给我写信的编辑同志就以手抄的方式，大约以三四千字的篇幅向我转述了蔡仪同志的书面答辩要点。后来我从笔迹上认出，这位编辑就是王信同志。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他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他对读者极其热情、负责，算得上是一位编辑工作者的楷模。1985年我出席《文学评论》优秀论文颁奖会，回杭时他还亲自送我到北京站，并坦诚地指出我文中的不足。我一直深深地怀念和感激他。自那次分别之后，近二十年就没有再相见了。我在此衷心祝愿他健康、幸福！

由于发现了自己还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写作的欲望也就陡然增强了。大概在1963年9月，我又写了一篇《对阿Q典型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寄给《文学评论》，不久就收到编辑部11月20日的来信（也是王信同志的手书），说我在文中“提出了一些较好的意见，曾准备于本刊第六期上发表”，“后来因为第六期有别的重要文章（按：事后我知道是指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论文），不得不将您的文章暂时撤下，留待明年第一期再发”。并将原稿寄还给我，嘱我“再作思考研究，补充和修改得更好一些”，“不要迟于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将稿子寄还。而修改稿寄出后不久，我收到《文学评论》编辑部1964年2月10日的来信，又是因为最后没有通过领导的审批而不能发表。这一下我懵了。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在当时我父母和舅妈的灵隐白乐桥住处收到这封信的。看了信后我在灵隐至上天竺的路上来回走了好几遍，觉得他们这样处理使

我太尴尬了。因为当时搞研究在有些领导眼里就是一种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表现,所以我是偷偷摸摸地寄稿子的,并且换用了王元骧这个名字。1963年11月20日《文学评论》给我的挂号信寄到中文系时,不知怎么搞的落在当时的总支秘书马锦书同志的手里,当他将信转交给我时,信封已经破损了,信也被他看过了。因为当时全国专门发表文学研究文章的刊物只此一家(另外,北京的《新建设》、山东的《文史哲》、上海的《学术月刊》、广州的《学术研究》作为综合性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也有专门的栏目),而杭大中文系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文章的唯有夏承焘先生一人,所以这事很快就传遍了中文系,在有些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马锦书同志是新闻系的毕业生,我教过他们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课,他是当作一件喜事来传的;但是我在与有些同辈教师接触的过程中,就发现了他们妒忌的眼光和热嘲冷讽的言语。我当时就感到有点压力,所以请《文学评论》编辑部以后给我写信就寄到灵隐白乐桥我父母和舅妈的住处,以免再发生类似情况。现在编辑部又说“不宜发表”,岂不是把我推向更为狼狈的境地?我猜测到这位阻止我的文章发表的领导就是当时文学所所长兼《文学评论》主编何其芳同志,因为这篇文章是分析阿Q典型的,文中所批评的对立的观点不再是蔡仪的“性格核心说”,而是何其芳在《论阿Q》中所提出的“共名说”。我觉得这两者尽管说法不同,但性质上却完全一致,都是排除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对典型形象作抽象化的理解。于是我在修改时为了加强理论上的分析分量就把何其芳的观点写进了文内。我认为这就是“领导”不同意发表的原因之所在。这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文学研究所总支书记唐棣华同志提出了我的两点意见:一、何其芳同志以他的观点为真理标准,容不得别人的批评,在《文学评论》中搞学阀式的统治;二、我两次向《文学评论》投稿,都得到如此的遭遇,编辑部出尔反尔,对作者是不够负责的。很快,我就收到当时的《文学评论》副主编毛星同志以他个人的名义写给我的五页篇幅的长信,说我的信文学所领导全看了,由他作为代表向我解